

“数据库的发展及其对亚洲研究的影响”

时间：2017年6月25日 13:00-16:00

地点：一桥大学西校区主楼 31 教室

园田茂人

大家好。我宣布，以“数据库的发展及其对亚洲研究的影响”为主题的本次榎山研讨会正式开幕。请从面前的材料中找出榎山奖学财团手册以及有关今天报告的材料。

首先，请允许我有请榎山奖学财团理事波多野优子女士致开幕词。

波多野优子

下午好。感谢您的介绍。我是榎山奖学财团审查委员会的理事兼成员，波多野。感谢诸位给我这次机会让我做一个简短介绍。日本亚洲政经学会理事长丸川教授，副理事长园田教授，我们榎山奖学财团对于能够与贵学会共同举办本次研讨会感到十分荣幸。也感谢各位在这样的阴雨天气仍能不辞辛劳前来参会。请诸位找出榎山奖学财团手册。

这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宣传册、40周年纪念材料以及去年第11届榎山纯三奖手册，此外还包括与今年该奖项相关的信息和申请表。我们早在1977年就开启了这个奖学财团。迄今为止，已是第41个年头。三十周年时，为表纪念，我们设置了榎山纯三奖，向在亚洲研究方面著有卓越著作的人士给予奖励，到今年也已是第十二届。在座的末广昭教授也是我们审查委员会的成员。

凡去年四月到六月末期间的所有日本出版物及有关亚洲研究的书籍均有资格参评。截止日期为六月底。目前已有多位像在座各位这样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提名了一大批优秀出版物，或许还有其他我们未曾知晓而诸位有所了解的优秀出版物。因此，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不遗余力地提名优秀出版物。

园田茂人

非常感谢。接下来，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为何要举办今天的研讨会。

想必大家都知道，亚洲研究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使用定性数据的研究员也开始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中获益良多。例如，如果要检查文献，只要利用网络就可轻松完成。这种技术不论是对研究议程还是研究方法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另外一点更为重要，即地区问题的全球化。亚洲研究涌现出了许多新的方向，比如，部分中国学者开始讨论是否能够开展中国全球化研究，这意味着中国的问题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全球问题。如此看来，一些问题已经变为纯粹的国际性和全球性问题。

但是今天，我想谈论一个以往亚洲政经学会的年会从未讨论过的方面，那就是亚洲数据库项目的日益增多。当然，进行亚洲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许多传统领域的研究专家仍以定性数据为主，包括观察、文件分析等。

无论我们乐见与否，许多政府或非政府组织都已经投入大量物力财力开发数据库项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几位专家，他们都参与过创设他们自己数据库的实践，有了这些数据库，不论专家、学者还是实践者，都可利用这些二手或一手数据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我想邀请每位发言人谈论一下自己国家数据库项目的经验，现在请允许我先简单介绍以下几位发言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国立首尔大学社会学系的金硕镐教授，第二位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王卫东教授，第三位是来自德拉萨大学政治科学系的罗纳德·福尔摩斯教授，他也是菲律宾大型研究机构**亚洲脉搏**（Pulse Asia）的理事长。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的吉野谅三教授。

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员来讨论四位发言人的演讲中没有提到的若干问题。一位是田中明彦教授，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GRIPS)的校长兼教授，另一位是庆应义塾大学媒体研究教授山本信人，目前任职于法学院。诸位也都了解，两位评论员也是我们学会的重要成员。

下面首先请金教授阐述他们国家的项目。有请金教授。

金硕镐

我是金硕镐，来自首尔大学。我所在的组织是韩国社会科学资料库，我们一般都叫它 KOSSDA。本次发言，我将主要介绍一下 KOSSDA 在首尔大学的主要活动和历史。

我们主要从事数据收集、数据积累、存档、宣传和教育工作。KOSSDA 是韩国的代表性资料院之一，在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和方法教育项目收集、宣传及推广研究资料方面首屈一指。

我们建立这个组织的时候，有参观过几家著名的数据库机构，例如德国的社会科学信息中心、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研究校际联合数据库和挪威的欧洲社会科学档案理事会。彼时，我们设法充分利用他们在数据库方面的历史经验。

1983 年，KOSSDA 作为一家非营利性社会科学图书馆建立起来。2003 年我们补充了调查数据库，到了 2006 年，又融合了数字资料和文献库。目前，KOSSDA 向用户提供部分社会科学资料并向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提供部分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我们也提供有关韩国的资料和文献综合在线服务。2015 年，KOSSDA 办公室转移到了首尔大学的亚洲中心。

KOSSDA 收集各种调查数据、统计表、采访和叙事历史资料、文件、观察记录和其他研究机构及个人生成的若干种类的资料。这建立起了数字资料档案库，并通过资料院的网站供研究者使用。换句话说，我们努力将定量和定性资料全部整合进一个系统。

我们的主要活动中，方法研习会，包括各种高级统计课程，在韩国非常受欢迎。每年会有来自其他大学的一千多名学生参加研习会。

2016 年，KOSSDA 获取了 191 套调查数据，并开发了一个带有其中 72 套数据的数据库。截至 2017 年 2 月，KOSSDA 已累积了 2251 套调查数据并能提供 211 个定性数据资料库。这张图片大体展示了从确认数据集、选择数据集再到传播数据的数据归档流程。

各位或许也有所了解，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韩国就已经有了建立社会科学数据实验室的趋势。我们每年都能获取数以千计的社会科学数据集，但出于数据质量原因考虑，我们从不采纳旧数据集。因此，我们正在努力从庞大的社会科学数据集中挑选出高质量的数据集。

至于数据采集，我之前也提到过，我们收集的是定性和定量数据。收集途径主要是学者个人和各种组织。KOSSDA 是一所由 100 多家政府研究机构和 50 多所大学组成的联盟机构。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与国立研究基金会合作，与研究员个人取得联系。我们也搜索各种期刊文章并加以分析，从而为我们的组织确定各种高质量的数据资料。

KOSSDA 的管理基础在于机构联盟。各联盟机构不仅在数据收集方面合作密切，而且在通过官方代表对 KOSSDA 进行运营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我们在联盟中拥有 111 多家研究机构。我们也与韩国几乎所有收集社会科学数据的机构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我们并不是收到数据后就原封不动地直接归档。一收到数据，我们就开始进行加工处理。数据加工指的就是清理数据。因此，我们会浏览数据并检查数据间是否存在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如果条件允许，也会检查原始调查问卷。

对数据进行清理并改正错误之后，我们开始建立元数据。元数据是对数据的一种概括或总结。对我们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任务，而且为了保护机密信息，我们还要将所有个人信息从数据中清除出去。定性数据中有许多是关于个人经历的私人信息和历史，因此我们也尽力将这些信息清除出去。

在我们建立元数据的过程中，使用的是德国合作伙伴提供的 DDI（数据文件倡议）。这是一种社会调查领域中的数据诠释标准。目前我们使用的是 DDI 2.1 版本。

政治、民意、劳工和雇佣等领域的数据是韩国社会调查界最受关注的的数据资料。最受欢迎的数据是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十年内有 700 多篇在知名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使用了韩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

我们的网站为用户提供英文服务，也为外国研究人员提供英文版网站。我们还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等国外机构签订了谅解备忘录。2010 年开始我们向这些机构的人员免费提供各种数据，据我所知，我们翻译为英文的调查数据多达 250 项。事实上，这 250 项数据是我们出于受欢迎程度以及数据质量方面的考虑精心挑选出来的。这样国外用户就能自由获取相关数据资料。

我们在韩国拥有超过 14000 名个体成员，在其他国家，我们拥有 150 家机构成员。他们每年缴纳会员费，而我们将办公室搬到了首尔大学之后，一直都在寻找资金以便我们能够免费向公众提供数据服务。但要找到合适的资金的确很困难。事实上，数据归档项目没有钱就寸步难行。

我们也提供 Nesstar 服务。什么是 Nesstar? Nesstar 是一个在线分析程序。通过 Nesstar，你能够对数据直接进行简单的频率分析或者逻辑回归分析等。Nesstar 也可以帮助你使用最小二乘法回归、逻辑回归、卡方检验、相关性等分析方法。这个程序是免费的。我们在 Nesstar 上上传了多达 250 套颇受欢迎的高质量数据。

自 2005 年开始，我们启动了韩国研究记忆库(KRM)项目。韩国研究基金会与 KOSSDA 合作支持 KRM 项目，我们在 KRM 项目网站上收集了多达几千套数据。韩国研究记忆库网站上有大量定性和定量数据，同时也上传各种数字化文章和书籍。因此这是一个庞大的项目。

KOSSDA 已经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研究团队来完成 2016 年年度报告《韩国社会趋势》的出版工作。我们与韩国统计局在 2008 年发起这一趋势报告项目，《韩国社会趋势》

是公职人员和学者中间最受欢迎的政府报告。该报告展现了韩国社会现在发生的一些转变及显现的趋势。那时我们还与韩国统计局合作制定了几个关键的国家指标。

我们也有教育和培训项目。

KOSSDA 对照夏季项目开发了方法培训，在考虑韩国本土特点的同时，采用了由密歇根大学大学间政治社会研究联盟 (ICPSR) 所提供的社会研究定性法。因此该培训项目非常受欢迎，我们也努力保持课程的高质量。具体而言，我们将每个班级人数控制在 35 人以内。事实上，学生要想报名参加夏季培训项目要经过诸多竞争。

每年，KOSSDA 在冬夏两季的研习班总共开设四个方法培训项目，提供同步的课堂学习和练习培训。而春秋两季的短期课程则主要是理论讲座。

此外，我们还组织若干有关著名韩国社会科学数据库的数据展会。韩国拥有至少 55 个大型面板数据库，我们也正努力在这些面板数据制作人之间建立网络联盟。我们也在积极管理这个关系网络以促进经验共享，进而提升数据质量。今年我们已经举办了两场数据展览。我们还面临着研究论文的竞争。

此外，我们也在努力建立东亚的国际网络，即亚洲数据库。去年，来自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四大数据库在首尔进行会谈。KOSSDA 与三个国家的代表性数据库举行了国际会议，分别是东京大学的日本社会科学数据存档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调查研究数据库，共同就亚洲数据库协会的创立进行了讨论。此次大会上，四大数据库均同意建立亚洲社会科学数据库网络，即 NASSDA，并为 NASSDA 的主要活动确定方向。

十多年来，KOSSDA 的关注点主要在于数量增长，但未来我们将重点提高数据库的发展质量。虽然 KOSSDA 在建立之初，学习了西方一些重点数据库中心的经验，但就规模和活动而言，跟西方还有很大距离。我们需要多向发达国家的数据库学习，例如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研究校际联合数据库、英国的经济和社会数据服务以及德国的社会科学信息中心等。感谢各位的倾听。

园田茂人

十分感谢金教授。下面有请第二位发言人，来自中国的王教授。

王卫东

二十年前，中国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乏数据。但自 2000 年以来，得益于学者获得的资金支持日益增长，中国大陆能够获取越来越多的数据集，中国科学界也已经意识到数据共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以及政府部门的科学研究基金会也开始认识到数据共享的重要性。

受历史条件的影响，我们建立了 CNSDA，即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CNSDA 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唯一一个社会科学数据库。CNSDA 受到了中国大陆首屈一指的国家级政府基金会，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 (NSF) 的赞助。这项资金支持始于 2012 年，到今年年底结束，但事实上，中国人民大学也对该项目有所资助。我们进行的是 1+1 平行资助。

这一轮的资金支持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宣布将继续为该数据库项目提供资助。但是我觉得自然科学基金会也会继续为该数据库提供资金。作为 CNSDA 项目的一部

分，我们于三年前，也就是从 2014 年开始提供在线数据服务。所以与韩国的 KOSSDA 相比，我们的历史比较短。

CNSDA 的使命是收集并保存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所有调查项目的原始数据和相关文件，这就好比每一本在中国出版的书籍都会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有所储存一样。因此，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对调查数据的收集和记录，向学术界开放通道并提供其他相关服务。

袁卫教授是这一项目的负责人。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任常务副校长，目前是我们的主任。而我是他的合作负责人，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CNSDA 的执行总监。

我们的团队有一位执行总监，那就是我，还有四位数据管理员和程序员、两位用户界面和视觉界面设计师、六位数据经理，以及多位兼职助理。我估计目前我们已经有二十多位助理。大多数都是本科、硕士以及博士在读学生。

为贯彻我们的理念，CNSDA 的所有软件都使用开源软件。我们使用的数据库是 MySQL，使用的脚本语言是 PHP 超文本预处理器，所用的网络服务器是 APACHE。所有系统都以开源的 Linux 系统为基础。

而要建立数据库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获取数据。事实上，在 2012 年以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实施相关项目，即通过搜索所有已出版的期刊论文、书籍和报告的方式搜索在中国大陆可以获取的所有数据。我们发现从 1980 年至 2012 年期间在中国大陆总共开展了 712 个调查项目。

这些数据中，286 项是为中国政府所有，197 项为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所有，127 项为商业公司所有，剩下的一百零几项则为某些海外学者和机构所有。

而为了使用原始种子数据集建立数据库，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同意开放几个主要调查项目，包括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中国宗教调查、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中国企业-员工匹配数据调查、中国企业人力资源调查和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这七个数据集是 CNSDA 首次开放，也是下载这些数据集的唯一渠道。

对于其他机构收集的 700 多个数据集，我们使用不同的策略获取将它们储存进我们数据集的权限。而为中国政府所有的数据集，我们逐一拜访相关的政府办公室说明我们的想法并努力说服他们允许我们收录这些数据，但截至目前，我们的努力少有成果，只有一两个能够成功。这是真实情况。对于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我们发送邮件或登陆他们的网站找到电话号码与他们取得联系。我们有得到一些正面回复，但并不多。如今我们在讨论数据集向大众开放的问题。

我们已将服务器转移到了云端存储。中国的一家云计算公司阿里云已经同意为我们的数据库提供免费的云支持。这真可谓雪中送炭。

目前为止，我们有 122 个调查数据集可供搜索并下载，大多数数据和文件都在我们的数据集集中有存储。但部分数据集目前只有与我们数据集建立链接的信息。在我担任执行总监之后，我努力简化注册流程。如今，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些数据，只需在线注册，即可在一分钟内下载所需的数据。

除此之外，我们也提供自我维持的在线问答知识体系。这对我们的用户会有很大帮助，我们也提供邮件、电话咨询服务。我们还提供部分不完全开放的数据服务，例如用户

的地理编码信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将我们的数据与一些人口普查数据及宏数据进行匹配。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数据库提供的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

截至目前，CNSDA 的注册用户数量已超过 3 万，截至去年年底，总下载量已经超过 20 万次。下载量排名前五的数据集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私企调查、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和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前两个数据集是由中国政府机构提供的，我是这些调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我们数据库的用户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目前，各学科中，用户数超过 200 位的共有 11 门学科。经济学、管理科学和社会学是排名前三的学科，紧随其后的八个学科分别是统计学、教育、新闻学、政治科学、法律、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

海外用户对数据的使用率超过 22%，有八个国家或地区的注册用户已超过 100 位。除了中国大陆的用户最多之外，第二位是美国，其用户数量超过 2000。第三与第四位分别是英国和日本。日本用户数超过 500。我并不知道他们都是谁，但我可以检索我们的数据库来确定。紧随其后的是韩国、香港、台湾、德国等地。

园田茂人

非常感谢。接下来发言的是福尔摩斯教授。

罗纳德·福尔摩斯

听完金教授和王教授的发言，我非常清楚他们的发展和我们的相比已经非常超前。就我们菲律宾的用户数量和所用的设备来看，他们就像处于第一世界，而我们才刚刚是新兴经济体。

我非常羡慕中国和韩国，因为他们都是以大学为依托。其实在菲律宾，调查研究的历史还算比较久。我不太清楚日本的调查组织是何时出现的，但菲律宾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经有调查组织了，可能是最先拥有调查组织的东南亚国家。但这段历史经历了太多波折。1985 年私营非营利性非党派组织“社会气象站”(SWS)的建立，让调查组织的发展又有了新的生机。我们的组织亚洲脉搏相对年轻，是在 1999 年成立的。

王教授刚才提到他们的研究中心面临着资源的问题，而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要自筹资金而不能依靠大学或政府，尤其是政府并不喜欢看到那些调查结果。而且，特别是现在新总统上任后，政府更加不喜欢看到这些调查结果。

我与 SWS 的同行沟通过。他们共有 566 个数据集，分别划分为 276 个国家数据集，也就是说 276 项国家级调查。他们进行的最大的一次调查拥有 57000 位调查对象的样本，是 2016 年做的一次投票后民调。SWS 调查的常规规模与亚洲脉搏相似，都是全国范围内抽样 1200 位，之后他们还会有 290 项次全国调查。

他们的全国调查中有五项专门用于比较调查，即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亚洲晴雨表调查。部分全国调查的比较调查小组都使用我们称作附加问题的全国调查。所以他们的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或选举制度比较研究项目可能会暴露出他们自己的一些问题。SWS 定期进行季度调查，其数据会存放在康奈尔大学的罗珀中心和密歇根大学的政治与社会研究校际联合数据库。而这些数据即将进入另一个名为 I-ASSIST 的国际数据库。

我们这个组织成立时间不长，只有 251 个定量数据集。自己的定性研究只有 13 个，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定量的。其中有 65 个是国家级调查，其他都是次国家调查。我们也进行了定期的季度调查，数据都存放在康奈尔大学的罗珀中心。在这

一点上，我们的组织与中国和韩国的情况不同。我们仍需要依靠菲律宾曾经的殖民国，也就是美国，在数据归档上给我们提供帮助，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全职人员来做这些事。

我们一般研究的问题是相对稳定的，是关于生活质量的问题。我们会问调查对象他们认为现在的生活质量与过去几年相比是提高了还是退步了，以及未来几年的生活质量是会比现在好还是坏。如果你看一下数据集，就会发现菲律宾人总是会说现在的生活质量相较于前几年下降了，但他们相信未来几年会变好。简而言之，菲律宾人在生活当中非常失意，但同时又是天生的乐观派。

我们也询问调查对象他们是否赞成政治党派。有趣的是，回答赞成的人不超过 10%。那么菲律宾人为什么不喜欢政治党派？因为美国人创造了一个党派没有那么重要的政治体系！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所说，我们的党派不过是在自嗨。另一方面，虽然投票是自主自愿，但仍有 80% 的菲律宾人参与选举，他们仍然相信选举可以促进民主。

菲律宾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在调查问卷中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在世界价值观调查或亚洲晴雨表调查中看到过。我们有时会设计开放式问题来了解民主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其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回答是“安全的工作”或“更高的薪水”，这些回答虽然与民主没有直接关系，但或多或少都是民主的成果。

园田茂人

感谢您的发言。下一位发言人是吉野教授。

吉野谅三

我就职于统计数学研究所。我们研究所没有数据库，但是我们在进行社会调查方面历史悠久。

我们研究所创建于二战期间，因此你能想象他们在战争期间的工作。二战之后，日本被美军占领。被占领期间，我们研究所接到一个新任务，那就是重组政府统计机构，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民意调查，以推进战后民主的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数据库项目负责人袁教授曾在我们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那段时间，我们在讨论日本的数据库，袁教授了解之后回到了北京，立即就开办了他自己的研究中心，然后开展了中国版的国民性格调查。盖洛普（韩国）公司的总裁 Park 先生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参观过我们的研究所。他对调查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返回韩国后创办了盖洛普（韩国）公司。因而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某种联系。

二战后，我们研究所帮助重组了政府的统计局和舆论调查方法，通过利用舆论调查方法，实施了持续 60 多年的日本国民性格调查。你们或许知道美国的综合社会调查或欧洲的欧洲晴雨表调查，但所有这些调查都是受 1953 年开始的日本国民性格调查的启发而开始的，因而这一调查可称为是全世界所有同类调查的鼻祖。

其他国家的研究所都将数据向公众开放，所以这些研究所在全世界的知名度都很高。但是我们的数据库尚未向公众开放。当然，我们正在出版许多总结报告，面向全球传播，但我们还不能说这些报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大约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我们将其中一项调查拓展为比较调查。我一直都在从事这一项调查，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这里是我们这项调查的部分清单。最近的十到十五年来，我们也将调查范围覆盖了部分亚洲国家。

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是我们在调查问卷中反复使用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再次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你想做男孩还是女孩？”60 多年来，日本男性的回答一直比较稳定，有 90% 的日本男性调查对象回答“还做男孩”，只有 5% 或 6% 回答“下次做女孩”。而女性的回答是怎样的呢。1953 年，64% 的日本女性回答“下次做男孩”，27% 回答“还做女孩”，但是这一答案一直在逐步变化，到了 1993 年，这些数据就完全颠倒过来了。

研究跨国可比性是我们的一项任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和调查方法。在日本，我们能够获得几乎所有居民或投票人的名单，因此可以进行理想化的随机抽样。但在其他国家，甚至是美国或欧洲国家，他们由于没有投票人的名单所以无法像我们这么做。正是由于随机抽样上的困难，他们在美国总统选举和英国脱欧公投的预测上出现了重大失误。

在此我就不再详细展开了，但对于跨国可比性，我们研发了科学的范式对国家进行对比，并将其命名为文化纽带分析或文化多样性分析。如果一开始就分析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而，我们一开始对比的是两个既有相似点又有不同点的国家或组别。

大约 20 年前，欧盟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当我们讨论亚洲国家一体化的时候，有些人发声批评，认为亚洲极富多样性，谈论一体化无异于天方夜谭。但现在，我们看到欧盟也存在不少问题，所以我们可能会找到更好的方法思考亚洲各国的柔性一体化问题。

通过过去的纵向调查，我们明确了日本的若干基本情况。在此我只强调一件事情。在过去至少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人际关系之间的态度比较稳定。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国家多年间的人际关系态度都是比较稳定的。诸位可以从我们网站上查看更多有趣的调查结果。

我们已经了解了由于不同文化、历史、宗教、经济和政治的社会情况以及语言和调查方法之间的差异，调查反馈的跨国可比性研究上会存在的各种困难。人们的回答是他或她自己的想法与其性别、种族、个性等各种因素影响的结合体。日本人一般会避免极端化的答案而更喜欢给中庸的答案或直接就说“不知道”，法国人喜欢选择带有批判性质或消极的答案，而印度人则倾向于选择积极的答案。

每个国家的调查方法代表了其自己的经济、历史、政治和社会情况。我们在分析调查数据之前，都会格外关注调查方法之间的差异。进行数据分析时，单一指标不太可靠，所以我们应该使用多维度的数据分析，将许多不同国家的多项问题答案数据汇总在一起，再去研究其间的拓扑关系。

我相信我们的调查数据能够帮助完善亚洲研究，提升我们对世界及其和平与繁荣的理解。但为了促进“以证据为重的亚洲研究”，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几十年持续进行纵向跨国调查的系统。但目前的数据收集与数据归档工作做得并不充分。

并且由于调查条件之间存在抽样方法、语言、经济和政治制度等诸多重大差异，我们需要对跨国可比性给予更多关注。对亚洲柔性一体化的一项研究就有可能为政策制定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我希望一些政治学家未来能够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

园田茂人

十分感谢吉野教授。

下面在进入点评环节之前，有几个问题需要请四位发言人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认为你们目前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事实或趋势是什么？你们当中有人提到了资金问题，但据我所知，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如何对数据进行充分利用。

田中教授和东京大学亚洲高等研究所的猪口教授在 2003 年至 2008 期间发起了亚洲晴雨表项目。但在我看来，最大挑战之一是即便有数据在手，也很少有用户能够通过使用这些数据而有所收获。即便制作、编辑这些数据的人非常了解它们的重要性，但要想吸引到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希望他们能够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这些数据写出新锐论文是非常困难的。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一定关系：你们如何找到克服这些困难的突破口？有几位发言人提到了宣传或者国际会议的重要性，但我想知道，你们是否想过有没有其它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

金硕镐

我刚才提到了，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但庆幸的是，我们研究所已经得到了一些大集团旗下文化组织的资助。我们每年能得到 50 万美元，但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我们还需要 50 万美元。所以，我们正在寻求与政府机构和一些公司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

而说到用户，数据库就是传播高质量数据并帮助他们出版高质量文章的渠道。在我的发言中，我介绍了几个教育项目以及数据展会的网络。但关键问题或者我也可以叫做挑战，在于我们能够让他们使用我们的数据进行学习并练习先进的统计方法。我们也开展了一些论文评选的项目，我认为是增加我们研究所数据用户数量的有效方法。

第三个挑战是我们与相关研究所的合作问题。

比如，我们与韩国综合社会调查(KGSS)的合作非常有效，原因就在于韩国的石贤浩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的汤姆·史密斯教授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事实上，汤姆·史密斯教授就是我的老师，我们一起发起了韩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韩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一建立，我们便于 2006 年建立了韩国社会科学数据库。

我们从其他政府机构和大学学者那里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高质量数据。但问题在于他们的兴趣点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不得不找到让他们与我们研究院合作的方法。这就是为何这段时间以来我们都在努力打造若干网络关系，便于让这些研究机构收集面板数据以分享他们生成数据的经验和诀窍。

我们在数据搜集方面也存在问题，韩国的每一家研究机构都想创建自己的数据库。不论我去拜访哪家政府机构，他们都告诉我说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但有一个现实问题是，这种做法只会让每个数据库的用户越来越少。

我们的策略是帮助他们创建自己的数据库。韩国电信为我们的服务器提供免费大容量云端存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服务器分享网站的部分内部空间。这十年以来，我们也努力给予他们一些技术支持并与他们分享在 KOSSDA 积累的经验。

最后我想举一个美国综合社会调查(USGSS)的例子。

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是由芝加哥大学的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实施的，其数据库一年的用户数量已超过 10000 位。而且，有 500 多篇文章在著名期刊上发表。他们的战略就是建立自己的网站，这样他们的用户就可以下载所需的数据。而更有趣的是，至少有五个网站能够为学术界潜在用户提供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密歇根大学的政治与社会研究校际联合数据库、康奈尔大学的罗珀中心、德国的社会科学信息中心以及印度的调查研究数据库都有权使用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的信息。

因此我认为，只要数据收集起来，尤其是大型的数据集，就应该向公众、向社会开放。

园田茂人

韩国的情况表明，许多研究机构都在相互竞争成为个中翘楚，但同时这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局面。这也正是金教授所提到的顾虑之一。

王卫东

中国面临的境况和韩国相似。

我们有太多学术调查机构都想做第一。但据我所知，这并不是最大的挑战。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说服中国政府开放他们的数据库。事实上，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中国政府是中国大陆主要数据的持有人。根据我自己的统计，中国政府拥有超过 40% 的数据内容或调查数据。这只是针对中国政府独有的全部微观数据或人口普查数据来说的。

实际上，我认为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数据开放的重要性。我们的现任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要迫使政府机构开放数据，但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执行总理的命令。尽管总理多次说到要命令政府机构开放数据库，但中国政府的官员仍缺少开放的动力。他们认为他们无法从开放数据库中得到任何回报。

另一大挑战是不同学科，而非不同机构之间的竞争。“经济帝国主义”在所有国家都是一个必然存在的现象。经济学家过于强调因果模型，相比于横截面数据，他们更喜欢面板数据或纵向数据。事实上，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和社会科学基金会都是由经济学家掌控的。所以近些年来，这些基金会的审查委员会都开始意识到，相比于横截面数据调查，他们应该为面板数据调查提供更多资金。

这个想法有点奇怪，但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大学都将继续实施社会学调查项目。因此自 2010 年以来，中国大陆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调查项目，包括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国人民大学的儿童健康和老龄化研究以及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等。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可能是中国唯一一项大规模横截面调查，为我们在不同社会问题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变量。幸运的是，上周我们的一位校友向我们大学捐赠了一大笔钱，因而我们能够继续顺利进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

园田茂人

非常感谢。对每个国家所面临困难的介绍恰恰说明了不同国家的独一无二。王教授刚刚提到了中国的“经济帝国主义”，我也想借此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当我在组织本次

研讨会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些在亚洲进行的不同学科的研究项目。但我发现很难看到有亚洲经济学家努力创建一个共同的数据集来将亚洲学者集结在一起。反倒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更热衷于做这件事。福尔摩斯教授，您就是一位政治学家，您怎么看呢？

罗纳德·福尔摩斯

社会气象站就是由一位经济学家创建的，他们花费了一段时间完成了对贫困问题的自我评估。庆幸的是我们没有王教授说到的“经济帝国主义”问题。

菲律宾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我们资源短缺，且缺少从事定性和定量综合研究的社会调查机构，而一旦有了这两样，我们就可以深入研究某一社会关注点或现象。只是，我们在菲律宾没有多少这样能够与我们合作或者专门从事数据工作的机构。

每次我们要设计调查问卷的时候——而这也正是我们耗费时间最长的工作——我都要搜索其他国家的调查项目。但我很少能找到中国、日本或韩国的调查项目，因为他们的调查问卷都是用他们语言写的。所以很多时候我最后都不是在阅读研究资料了，而是在浏览密歇根大学的消息。因而如果韩国的 NASSDA 能够帮助我们将一些调查问卷翻译为英文，能够允许至少东南亚国家访问他们的数据库，那就再好不过了。

园田茂人

说到统计数理研究所，我觉得它虽然历史悠久却至今没有自己的数据库，这一点还是很少见的。研究所一直致力推动国际对比研究，我想听一下研究所或教授个人遇到的困难或挑战。

吉野谅三

就像我说的，我们还没有将我们的原始数据向公众开放。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来，我们都在努力创建自己的数据库，并不一定必须是在我们研究所，但一定是要在像科隆大学的社会科学信息中心或者康奈尔大学的罗珀中心那样的大型研究所。我们调查团队的规模相对较大，研究所总共有大约 45 位成员，但其中只有两到三位成员将会加入社会调查项目。我们将实施几个大型的调查项目，但由于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这些项目实施起来将会有很大困难，虽然工程师是能够毫无障碍地得到大笔的研究经费。

但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二战前美国根据大数据对总统选举结果的预测遭遇了失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小规模但高质量的统计数据进行预测。但这段时间我们的工程师谈论的除了大数据还是大数据。我们的日本国民性格调查持续了 60 多年，但每一次我们开始进行调查时，我们无法从政府那里获得资金，只能进行纵向调查。因此我们假装要进行的是一个全新的项目才能得到资金支持。

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你可能能够理解按时间序列对比进行纵向调查的重要性。但每当谈论到国民性格调查，官员可能就会说“只进行国民性格调查没什么好处”。这是官员一贯持有的态度。所以要拿到进行调查的经费真的非常不容易。

如今，日本年轻一点的官员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调查。近来，全世界都在讨论以证据为重的政策制定方法。一次我与一位年轻官员讨论这个问题，他对此发表了一些悲观的观点，无法支持我们的调查。另一方面，许多来自美国、欧洲或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尽管对日语一窍不通，也都来到日本，让我们帮忙挑选一些统计报告供他们进行研究。这是全世界政治学家的固有态度。但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日本的官员与他们如此不同。

园田茂人

非常感谢。所以有些问题是和资金相关，而有些则是与得到的支持有关，比如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不同的国家问题不同，但必须再重申一次，我们要将每个项目看作一次创造公共空间供研究员共享数据的尝试。

十分感谢各位对我这两个复杂问题的回答。接下来，有请田中教授对我们这些讨论进行点评。

田中明彦

感谢园田教授以及四位小组发言人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信息，我们都要好好理解消化一下。我想跳过我准备的一些客套话，直接开始我认为与今天的讨论比较切合的话题。

今天的发言基本上都是有关调查数据和调查数据库的。但是我想首先谈一下目前我们面临的多种形式的数据库问题。

经济学家现在只要轻轻一点，就能够下载使用世界发展指数(WDI)的全套数据。WDI指数全都集中在了一个 189 兆字节的 CSV 文件，包括了从 1960 年到 2016 年 264 个国家的 1504 项指数，其他相似数据也都可以通过多个国际组织获得。IMF 为我们提供了 3 千兆字节的国际金融统计局和贸易方向统计的数据，也是一个庞大的 CSV 文件。此外还有众多国家经济统计数据。

提到经济学，现在我们所在的一桥大学长久以来都以收集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统计数据而闻名。除此，许多调查数据现在也实现了归档，还有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各种晴雨表调查、国家和媒体调查都已经实现了归档。

除了这些数字资料，我们现在也拥有诸多文本资料。如果你浏览报社网站，你能得到他们从 19 世纪或整个 20 世纪至今的全部报刊报道数据库。我们的数据库名为“世界与日本”，规模并没有多大，但也可以提供 8000 多份文件，对国际研究大有裨益。如果你登陆日本国会网站，你能搜索到 1945 年至今所有国会讨论的记录，包括全体会议和委员会会议。其中有很多是对社会、经济和历史分析大有帮助的图像数据。日本亚洲历史记录中心目前正在利用所有原始文件的图像资料编辑从日本战前至今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记录。因而我认为，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数据是极为丰富的。

对各领域的专家和社会科学家来说，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用这些数据。我认为正是在这一问题的推动下园田教授才引导我们如今聚集在这里。然而，矛盾的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叫做数据缺乏。如今，如果数据不存在于网络中，那就相当于根本不存在，至少对年轻人来说越来越如此。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把你的文件或数据资料上传到网上，你就会被整个世界忽略。

我认为这与吉野教授所提到的日本国民性格调查所面临的困境有一定相关性。我发自内心地非常支持统计数理研究所能够将下一轮日本国民性格调查的原始数据向公众开放。如果不这么做，没有人会去关注。

同样，还有一大批数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不过是因为它们并没有像日本新闻媒体公司将调查所得数据那样不设任何限制地向公众开放而已。每家报社几乎每个月或每周都会进行一项调查，但他们从不允许公众使用这些数据。原始数据全部都被隐藏起来，只有有限的数据可供使用，例如安倍的支持率。换句话说，你根本没有任何途径去查看数据，了解都是什么人为什么支持安倍。

数据缺乏的原因可能是资金不到位。比如，猪口教授、我和园田教授努力推动的亚洲晴雨表项目，在 2008 年完成了数据收集工作，自此之后再也没有进行过数据收集。即便你有非常有价值的调查数据，这些也有可能被终止使用或从网络上被迫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就意味着这些数据不再存在了。

下一个问题我一般叫做“有条理的数据还是杂乱的数据”问题。

一般而言，对于文本资料或图像资料，最重要的用途和目的就是确定你想要阐述什么。如果你能够找到一篇文档帮助你在专著中证明某人是个小人，这就足够了。但是，一旦你开始使用大数据，你可能会碰到杂乱数据和有条理数据的问题。就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写到的那样，“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之后，威克姆和格罗勒芒德在《R for Data Science》(2017) 中改写到“有条理的数据集都是一样的，但每个混乱的数据集各有各的混乱之处。”我认为难以说服学生和其他人去分析大数据集的问题之一就源于数据的杂乱。

通常而言，阅读代码簿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如果你需要使用单一的调查数据来工作，或许你已经能够对代码簿习以为常，并且对数据集可以使用自如。然而一旦你需要同时使用世界银行或其他机构提供的社会经济信息等不止一个数据集来分析数据，你就不得不按照两个迥然不同的类别去处理杂乱无序的数据。有时，甚至连国家的名字在不同的数据集中都不一样！

例如，世界发展指标调查中不同国家使用的还是 ISO 代码，但到了不同的国家，他们对代码的使用却与 IMF 不同了。尽管世界银行的办公室与 IMF 毗邻，但他们在代码上只要有一点点不同，日积月累下来也就完全不可能同时使用两个数据库。正如威克姆所说，80% 的数据分析都花费在清除和准备数据的过程上。一旦你能够成功清理好数据，你就能够利用强大的统计程序用剩下的 20% 的时间完成你的分析，但往往是这之前的 80% 的时间是我们的挑战所在。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其实并没有确切答案，但我想分享一些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其实无须是什么独一无二或极具想象力的事情，我只是觉得调查数据应该保持统一的格式，统计数据也应该保持一致的格式。

我认为所有处理数据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教育他们的后辈要提高首先用自己的专业分析数据的能力。或许我们应该就先从一份调查数据入手。但之后，我们应该不再局限于使用单一的调查数据，而是将个各大组织的社会经济数据同调查数据结合起来，再进行分析。当我们进行亚洲晴雨表项目时，许多作者都被要求分析亚洲晴雨表的数据来撰写论文，但我就会比较害怕要对他们讲要把亚洲晴雨表的数据与其他来源的数据结合起来其实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任务。

但恰恰许多情况下，调查数据都需要与其他社会经济数据相结合才能够更好发挥作用。假设你问日本人他们开心与否。他们的回答或许是“嗯，没有多么开心。”但是如果你向泰国人问同样的问题，他们可能就会回答“我很开心。”他们的回答模式可能与这些日本人有所不同，我认为对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调查可能会突显一些文化变体或社会经济学因素的重要性。这些因素可能从调查数据本身当中是无从获得的，这就意味着你应该对发展机构或政府提供的这些数据进行后续追踪。

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应对文本数据库。大多数文本数据库的用途都是找到某篇文本这样的具体目的。总理的演讲有上百篇，外交部长及其他官员的演讲也有数百篇，那我们为何不能将这些文本当作一个重要数据来源，去分析其中的大数据和经

济趋势呢？我认为文本的量化是对未来发展的一大挑战。近来越来越多的电脑程序能够对诸如日语或中文这些语言作形态分析。曾经，要对日语或中文进行分析还困难重重，因为很难判断词汇的构成，也不知该如何断句。但现在形态分析程序已经越来越完善。所以我们能够对文本进行量化分析。

总而言之，从庞大且杂乱无章的大数据中整理出有条理的数据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感谢各位的倾听。

园田茂人

感谢田中教授。下面，有请山本教授对我们的讨论进行点评。

山本信人

我在想我为何受邀在这里进行点评，因为我是以质量为重的研究员，而不是以数量为重。我一直将自己视为是领域专家，尤其是对印尼这一块儿。尽管我的几位学生如今对这些调查数据分析或大数据分析很感兴趣，但我其实对这种类型的研究并不怎么熟悉。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想要从领域专家的角度问诸位几个简单的问题。

虽然吉野教授刚才提到当今的官员对调查数据并不重视，但调查数据对于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仍是很有用处的。所以正如福尔摩斯教授在讨论中提到的那样，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完善方法，尤其是阐释力。

在东南亚研究的大背景下，调查数据研究在 21 世纪发展迅速。这与政治或社会政治条件也有一定关系。得益于菲律宾的民主化，调查数据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开始发展了，之后韩国、台湾、印尼等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开始发展。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社会条件之下，外国政府和外国援助帮助调查数据分析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受欢迎。

调查数据分析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就是选举研究。拿印尼来说，有了日本和美国的官方援助之后，他们建立了调查研究所并开始实施民意调查。以前印尼不过只有一两家调查研究所，而现在已经有了几十家。他们竞争业务，为客户努力工作。有时候他们甚至为了客户的利益而操纵数据。一些政党有自己的数据分析调查机构，他们总是能为自己找到极为重要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对公众或研究员而言可能毫无用处。

现在这种新的趋势在推动着我们，这意味着各领域专家，要与数据调查的科学家、制作者或设计师合作。但现在很难找到有这种行动力的新一代学者。那些在印尼做研究的人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或 21 世纪早期在美国或英国接受过教育，后来由于民主化返回印尼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可惜的是他们都向钱看。而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地位。他们无法在印尼或其他国家寻得任何学术地位，所以他们就开始以赚钱为重。从某种程度来讲这是非常可惜的，毕竟他们都是具备杰出技能的学者。

现在要进行跨国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多数数据收集和分析都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他们都为了本国的目的而进行研究，所以跨国研究难以进行，除了亚洲晴雨表和欧洲晴雨表这样的案例。此外，你还需要对一国的情况比较精通或有所了解的人员协助你对数据进行分析，否则很难在各国间展开对比。

第三点是调查研究在印尼已经由于政治目的和商业目的成为了一个大产业。我认识的一些研究员总是在讨论方法，但是他们的语言和我的完全不同。大多数时候，我都不理解他们的讨论使用的究竟是哪种语言。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人们如何以这种方式去感知某一话题或环境。领域专家一般会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

我们正在研究的国家。这就是传统领域专家处理研究问题的方法。但这也正是调查数据分析多年来一直忽视的事情。

各位发言人提到的问题大体如下：第一是如何进行跨国分析，第二是调查的可信度。

未来，我认为开放数据通道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生活在基础设施不健全的欠发达国家学术界的研究人员来说更是如此。对菲律宾和印尼来说，年轻人没有使用网络的免费渠道。他们也没有使用新型模型的先进技术。他们没有任何设备也无法进行任何研究，所以如果你可以让这些数据轻松为欠发达国家的这些年轻人和学者使用，这将有助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如果你可以创办如何使用数据库或如何分析数据库的在线论坛，这也有助于开辟全新的研究领域。这正是我在像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媒体案例中已经开始的工作。人们都在创建能够谈论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论坛。可见，基础设施已经到位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提供数据让他们能够讨论彼此的新想法。我估计这其中也暗藏着亚洲研究的未来方向。谢谢。

园田茂人

感谢山本教授。现在，请四位发言人对我们两位教授给出的点评作出反馈。

田中教授提到了三角互证的重要性，虽然这个方法比较困难。山本教授提到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请各位对两位教授的点评谈谈你们的想法。

吉野谅三

十分感谢田中教授。您鼓励我们开放数据，我们一定会这样去做的。对于您提到的三角策略或……

田中明彦

三角互证方法。

吉野谅三

我们可以通过结合几个不同的数据集来开始全新类型的分析，这是事实。这对说服人们在日本构建数据库是至关重要的，之前我已经多次强调过了。但在现实中，对于像从谷歌等网站上获得的社会大数据，由于如今个人身份保护程度加强，我们在使用时要格外谨慎。将某种数据与我们的数据相结合或许会产生另外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对待。

园田茂人

十分感谢您指出了结合不同数据集所存在的负面问题。

金硕镐

对于把不同类型数据相结合这个问题，我想谈几个积极方面。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使用数据解释一些社会现象。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保护个人信息，就能够根据诸如结构特征和个人特征及其属性等，使用分层线性模型来解释个体因变量。

KOSSDA 正在努力提供有关当地政府的的信息。韩国有 234 所地方政府，我们在努力为用户提供地方政府的特点和组织特性，诸如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当地社区移民比例等。

不同类型数据相结合的第二个积极方面是我们拥有韩国 Twitter 用户的所有信息。事实上，是韩国 Twitter 公司向我们提供了这些信息，我们与擅长做社交网络分析的 Cyram 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他们创造出了 NetMiner，这是一款与 UCINET 或 Pajek 类似的网络分析工具。因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辨别社会调查的个人用户。我们正在努力将 Twitter 上的文本信息与实际调查中的反馈相结合，因而我们能够将大数据和调查数据共同利用起来。

罗纳德·福尔摩斯

我想对跨国调查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我们在跨国调查中进行了很多条目的调查，并发现了人们是更倾向于平民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等问题的结论。我们使用美国人和欧洲人研发的模型来考查一个国家的国民中是平民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居多。当我们在翻译这个问题时，我们碰到了困难，因为在菲律宾，多样性这个概念指的就是“自由”。我不知道其他亚洲人是否能理解我们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够以这种或多或少会反映我们经历的方式来翻译这个问题。

在西方国家，他们讨论多样性的时候他们都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但在许多亚洲国家，多样性的概念是存在差异的，对我们而言可能会过于抽象而让我们在其含义上无法达成一致。我们发现了一个如何延伸跨国调查的方法。调查中的一些问题其实没有必要彼此呼应。例如，我们对菲律宾一些问题的理解在印尼不一定成立，因为各国都有不同的背景和历史。

王卫东

我也想就如何结合不同类型数据举几个例子。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样本数量超过 20000 个，这算是全国的代表性样本。在这项调查中，我们让受调查学生的父母、老师和学校负责人也全部接受研究调查，这样我们能够将调查数据与学生的就医记录数据相结合。

要让所有人都同意是非常困难的，但还是有 95% 的学生提供了他们的住院治疗信息。我们也将学生的调查问卷数据与对他们的个性、动机以及自我效能感等心理测验数据结合起来。

这样结合的目的之一是防止近视，这种现象在中国越来越普遍。为顺利进行调查，我给了每位学生一个腕带作为礼物。利用这个腕带，我们能够持续收集有关学生所做活动和所处地点的信息。我们也让学生提供他们在微信或 QQ 上的社交媒体数据来分析他们的行为。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人民银行，它拥有所有国人的银行账号。我们根据这些账户数据做了一些研究，随机抽取样本并向他们寄送调查问卷。我们删除了所有身份信息且账号信息全部保密。

园田茂人

非常感谢。下面我们开始全体讨论，台下若有问题欢迎提出。有什么问题吗？

益尾知佐子

我是益尾知佐子，来自九州大学。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对外政策，所以我通常接触的都是定性数据，而非定量数据。考虑到未来可能与中国同行合作，我想要向王教授请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未来国际合作研究的，您认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政府会允许国外研究小组与中国研究小组合作呢？另一个问题是您与中国的政党或政府有多少信息上的合作或交流？

王卫东

对于第一个问题，说实话，很难。中国的研究员都很清楚，如果我们想要进行国际合作研究，我们必须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在我们的体系中，提交申请时，有些许可证会比较奏效，但我们到现在从未成功获得过任何许可。在我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公室里张贴一张许可证，但我们从来没有用它成功申请到许可。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也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资金支持。所以如果想在中国获得资金，就要尝试从与你志趣相投、有可能进行合作的人士那里寻求办法。然后你就可以利用这些社会关系，这是我的建议。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在中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对我们来说，这也是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未来会如何，但我认为现在的政府已经极大改善了这种情况。

园田茂人

还有其他问题吗？

大庭三枝

我是东京理科大学的大庭三枝。我一直在研究亚洲区域机构，包括东盟的发展问题。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福尔摩斯教授。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与东盟成员国以外国家的研究机构或大学进行过获取或构建数据集的国际合作项目？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您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国际合作项目，那您是否了解东南亚国家构建社会科学数据集的现状？

罗纳德·福尔摩斯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曾经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实施过一个有关金钱政治的项目，还做过实验调查。这些调查都是由调查组织默迪卡中心在马来西亚完成的，在印尼是由 LSI (Lembaga Survei Indonesia) 进行的，而在菲律宾则是由亚洲脉搏完成的。我们本来还应该在泰国进行一次，但正好泰国发生了政变。这些就是我们进行过的合作。

由于东南亚的国家过于多样化，我们与东南亚的众多调查机构鲜有合作。我在这里就不提某个东盟国家的名字了，但是我在那里的时候觉得自己被跟踪了，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无论如何最后我还是安全回家了。

社会气象站曾经参与过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台湾国立大学的亚洲晴雨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我之前提到的选举研究调查等。我曾与 SWS 在一起工作过，所以他们一直与我们有合作。我们曾经进行过一些研究，但不一定是与东南亚的机构一起，更多的是与多边机构的合作。就数据生成而言，东盟是我们合作最少的组织。

园田茂人

亚洲学生调查第二轮调查是于 2013 年在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本科生之中完成的，这个调查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东盟的学生对美国 and 东北亚的态度更积极，而对周边国家的态度相对消极。

王卫东

对中国的国际合作我还想多说一点。

中国的几个大型社会调查项目更容易为国际研究员提供开放模型的机会。如果你认为某个问题对中国的研究至关重要，那你可以直接向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或中国教育追踪研究递交提案即可。发送英文的提案就可以。如果提案被接收，那你就能够获得这些数据。而且无需支付费用。中国政府会为这些工作埋单。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园田茂人

非常感谢王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些好消息。

我们今天的讨论十分精彩。今天的讨论都有记录，我们之后会拿到文字整理稿，如果各位对某个话题感兴趣可以从中详细了解相关信息。

我们的檉山研讨会到此结束。感谢诸位的参与和倾听。